

社会性别与发展 译文集

Selected Translations
ON GENDERS AND DEVELOP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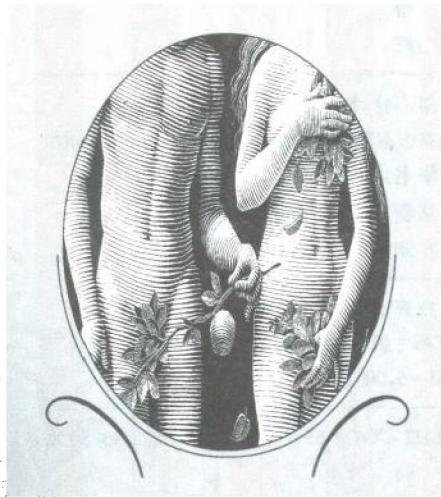
主编 马元曦 副主编 康宏锦 杜芳琴



社会性别与发展 译文集

Selected Translations
ON GENDERS AND DEVELOPMENT

主编 马元曦 副主编 康宏锦 杜芳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马元曦等主编 . - 北京 : 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3

ISBN 7-108-01422-X

I . 社… II . 马… III . ①妇女学 : 社会学 - 文集
②女性 - 关系 - 社会发展 - 研究 - 文集 IV . C913.6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2746 号

责任编辑 张 琳

封面设计 张 红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世界知识出版社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172,000 字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册

ISBN 7-108-01422-X/C · 65

定价 13.50 元

前　　言

以社会性别的视角研究、分析和实践“妇女与发展”、“社会性别与发展”等问题已成为全球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和讨论的议题。《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即以此议题为中心收入了 10 篇文章。由于篇幅有限，所选只是现有文献中极小的一部分。10 篇文章中除一篇发表于 80 年代，其他均为 90 年代所作。文章就“妇女参与发展”、“妇女与发展”和“社会性别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及妇女贫困化的现象从不同方面、层面和角度提出问题、描述现状、追溯原因并提出对策。如《正确的概念和错误的概念：讨论妇女与发展问题的历史文化背景》、《贫困女性化？——有关概念和趋势的笔记》、《难以捉摸的议题：将妇女参与发展纳入主流》等文总结了过去三十年，尤其是被称之为“妇女发展的十年”（1985—1995）以及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来，发展理论上的种种不同看法、论点及实践中取得的正反面的经验与体悟。

总的说来，这些文章大致提出了如下一些问题：（一）近二三十年来，全世界经济增长在使人们（包括妇女）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贫困人口中妇女所占比例上升，随之形成一些研究者们提出的“贫困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贫困以妇女的面

孔出现”(poverty has a female face)、“贫困在妇女中代代相传”等概念,这究竟是为什么? (二)在经济处于转型期的一些社会中,新自由化经济政策、结构调整政策及人口变化,造成家庭状况变化等因素对妇女就业机会、生活质量(包括教育、健康)以及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包括资源分配)有什么正面负面的影响? 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如何? (三)在从“妇女与发展”逐渐走向“社会性别与发展”过程中如果要真正理解社会性别的含义,必将涉及男性与女性之间关系、地位、各种机会方面的不平等,在理论上也许一些人可以承认这一点,但在实际解决问题时为何如此艰难? (四)为什么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话语对第三世界妇女形象传统式的再现虽一再经受抨击,却仍然十分盛行? (五)如何将“妇女参与发展”、“妇女与发展”和“社会性别与发展”的理论探讨、策略计划的制订结合上述提及和未提及的问题并与不同国家或地域的历史、文化、经济、宗教、阶级、种族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研讨? 正如乔安娜·德·格鲁特在她的文章中指出的,“……把妇女情况放在历史上和当今社会性别、阶级和社区以及内部/外部影响的复杂背景下来讨论”。如何将“社会性别与发展”纳入主流,将是十分重要却又是极为艰辛的课题和任务。

本译文集还有一些文章是集中某一专题进行阐述的,例如,介绍和对比各种不同的培训方法、测量妇女贫困状况的标准、对方法论的探讨、“乡村银行”对妇女的影响等等,都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和进一步探讨批评的问题。路易莎·沙因的《中国的社会性别与内部东方主义》一文则是从一位西方学者的眼光评述中国民族与社会性别的关系之一隅,更可引起我们的警觉与评论。

无论是哪一类的文章,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以许多实例、个案

分析解释问题，归纳论断，提出各种不同的思考结论，进行相互挑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许多文章中都强调妇女的主体能动作用，妇女应为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经济社会地位积极参与，主动出击，赋权于自己，只有这样，妇女才不是一个接受发展援助的被动者，而是推动整个发展进程的一个积极能动的组成部分。

参加翻译审阅本译文集的均为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的成员。翻译和审阅的过程也是我们学习“妇女与发展”、“社会性别与发展”理论、方法和其他知识讯息的过程。

在确定题目重点、挑选原作方面，我们得到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 Valentine M. Moghadam 博士、狄更森学院 Ann Hill 教授、密执安大学的 Carol Hollenshead 教授、Owusu Maxwell 教授、Norma Diamund 教授和伍岬博士、东北大学的 Chris Gilmartin 教授以及犹他大学的徐午博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们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并对赞助本译文集出版的福特基金会表示衷心感谢。

马元曦 康宏锦

1998 年 10 月

目 录

前 言	马元曦 康宏锦	1
正确的概念和错误的概念：讨论妇女与 发展问题的历史文化背景..... 乔安娜·德·格鲁特 1		
贫困女性化？	瓦伦丁·M·莫格哈登	31
——有关概念和趋势的笔记		
使发展理论具有社会性别意识：国际发展机构中的		
妇女参与发展 (WID) 计划	吉塔·韶瑞	63
测量发展中国家妇女贫困问题	伊娃·米勒	80
中国的社会性别与内部东方主义	路易莎·沙因	98
扩大农业研究与推广工作的视野：		
方法论的挑战	安德里娅·康沃尔	122
	艾琳·吉特 艾丽丝·韦尔柏恩	
乡村银行	苏珊·H·霍尔库姆	161
附录 贷款给那些应得到的人	默哈穆德·雅纽斯	181
社会性别计划的培训战略：		
从增强敏感度到技巧和方法	卡罗琳·摩塞	189
社会性别计划培训	卡罗琳·摩塞	211
——方法论及内容		

难以捉摸的议题：

将“妇女参与发展”纳入主流	罗纳克·贾汉	231
论文出处		237

Table of contents

Foreword	Ma Yuanxi & Kang Hongjin
Conceptions and Misconception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Discussion on Women and Development	Johanna De Groot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Notes on a Concept and Trends	Valentine M. Moghadam
Engendering Development? Women in Development —(WID)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gimes	Geeta Chowdhry
Measuring Women's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va Mueller
Gender and Internal Orientalism in China	Louisa Schein
Extending the Horizons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Andrea Cornwell, Irene Guiji & Alice Welbourn
Grameen Bank	Susan H. Holcombe
Appendix	
Credit Where Credit's Due	Muhammad Yunus

- Training Strategies for Gender Planning:
from Sensitizing to Skills and Techniques Caroline O. N. Moser
- Gender planning training: Its Methodology and Content Caroline O. N. Moser
- The Elusive Agenda: Mainstreaming Women in Development Rounaq Jahan
- * Sources of the Translated Articles

乔安娜·德·格鲁特

伍 呷 译

康宏锦 译校

正确的概念和 错误的概念：讨论妇女与 发展问题的历史文化背景

[按] 荷兰人类学家乔安娜·德·格鲁特的这篇论文是对形成有关第三世界妇女参与发展问题的各种观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影响的审议。她指出，从 17 世纪到 19 世纪，欧美外来势力对当今称之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和影响，不仅涉及政治和经济层面，也涉及到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她通过大量生动的事例说明，欧美势力如何在他们成功的优势上，建构非欧洲的，尤其是非欧洲妇女的“他者化”，从而形成对非欧洲妇女形象的歪曲：落后和低下。她还指出，这些错误的观点和负面的影响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尽管受到过去二十年的妇女运动以及以

妇女为中心的学术研究的挑战和批判，至今仍然阴魂不散，不可等闲视之。作者呼吁要在现有的好作品的基础上，对有关妇女与发展的历史和历史编撰工作进行不断的挑战。

要想对妇女参与“发展”或妇女参与“发展”的经验，进行讨论或有所理解，都得恰如其分地强调这个问题的物质层面及其现实意义。然而，当前的情况实际上是历史过程的产物，正如发展的物质层面也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一样。本文把当前妇女与发展过程之间的关系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讨论历史文化因素对发展政策的形成和运用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对于“发展中”或“第三世界”当今社会和人民的需要、情况和问题已形成普遍接受的观点，这些观点的形成（不论是好是坏）受到屈从于上两个世纪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势力的历史经验的影响，也受到由此产生的西方对非西方人们的看法和设想的影响。从本文的观点来看，更重要的是这些经验和态度都有着鲜明的社会性别特征，也就是说，与男性角色恰恰相反的女性的性格特征和女性角色规定的具体定义和理解，是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之间冲突的焦点，也是为后者设计的控制和“发展”政策的焦点。

出现在本论文集题目中的“发展”一词，在新闻媒介、学术界以及日常话语里，已被广泛运用，然而尽管如此（也恰恰因为如此），慎重考虑这个词的内容、产生的背景及其含义，以便澄清我们对这个词的用法，显得非常重要。由于我们对这个词很熟悉，因而都自以为“懂得”它的意义；其实，这些意义及其根源都需要剥开来分析。本文将从分析着手，来叙述历史上“发展”的概念和运用是怎样建构的，而这种建构一般都是“外来者”对亲身经历“发展”的社会和人民的理解和评估，尤其是对女性角色和生

活的曲解和边缘化。我之所以强调历史上建构的概念，是作为对发展工作（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采取非历史和反历史态度的一种明确的批评，这种态度以“不受价值约束”的社会科学里含糊的概念为基础，以科学技术而不是以人的作用为基础，还以设想发展问题“不以时间为转移”的特征为基础。我之所以强调把所谓“不发达”社会当作发展“专家”或学术理论家的观点和政策的被动对象来对待的问题，是因为这种社会内部的实际经验和想法对于分析和推行政策显然很重要，因此忽视这个问题，在学术上是不健全的，在实践中是百害无益的。我之所以强调对女性生活的边缘化和曲解，部分原因是因为西方的妇女学需要跟至今仍然影响着对第三世界妇女的看法的种种曲解和偏见分庭抗礼，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对于发展理论和实践来说，妇女的大多数（多种多样，各不相同）应该是中心所在，而不是什么边缘问题。

80年代后期，研究与发展相联系的各种过程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家当中，很少有人认为这个概念简单明了、无可争议。由于过去的历史参差不齐，社会经济或政治结构五花八门，特定社会变化的方向和幅度也各有千秋，因此，“发展中”、“发达”和“不发达”之间的区别只能作为一般的标尺。在第三世界经历各种危机的十年当中，从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非洲的生存危机直到中国的共产主义计划危机，厄立特里、伊朗和尼加拉瓜的战争和革命的后果，发展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不论是当地的还是跨国界的问题，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也不论是国家的还是私人企业的问题，都可谓层出不穷。在计划、新技术或城市发展对第三世界的生态、经济和社区造成的种种不平衡的、经常是不可预测的后果面前，简单地把发展跟生活提高等同起来是

不能持久的，不论是在亚马孙河流域的森林地带、东南亚地区出口制造业区、开罗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棚户区都是这样。最近有关发展的文章通过理论分析，通过对特定问题和社会的具体的和经验式的研究，对这些问题和困难进行了讨论，也提到一系列新的观点，其中最重要的是逐渐认识到妇女的重要性：妇女是第三世界社会、经济和“发展”中人数众多、与众不同、但直到最近仍然被忽视的人群。

本论文集是有关第三世界社会里妇女参与发展的问题。而我本人要做的是对形成这个问题的种种观点和讨论的某些历史文化影响进行审议。然而，这个题目需要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对现在称之为第三世界社会的态度进行审议。这些不同的态度是这些社会跟外界影响和干预（物质方面的、政治方面的或文化方面的干预）之间的历史关系的产物。这种关系在当代史上越来越重要，不仅形成许多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而且也形成它们彼此之间的看法和理解。虽然不宜于在这里对这些发展情况做全面且细致的探讨，但是如果想要了解有关妇女与发展的论争和观点的历史，大背景的某些方面还是值得一提的。

那些今天被称之为“不发达”或“发展中”社会，大多是直到最近，仍然始终长期或一度处于外来势力——不是欧洲的就是北美的外来势力的直接影响和控制下。把这一点当作我们的起点，既重要，也很熟悉。从 17 世纪到 19 世纪，这些社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日益扩大、日益强化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是以欧洲主导的金融商业网、政治关系、通讯以及领土和殖民掠夺为基础的。在这里不宜于详细叙述这个既复杂多样又相互矛盾的过程，这个过程跟“世界体系”的历史上一些重要的事件，比如，加勒比海奴隶种植园经济的兴衰，欧洲对亚

洲纺织加工业的影响，或非洲的殖民化与非殖民化过程是分不开的。但是，有必要在这里对发展政策和发展研究的历史以及妇女在这段历史过程中的处境提出特别重要的几点。这些将通过具体实例进行讨论，而不打算做既乏味又无益的概括。

首先，“世界体系”这个概念不限于针对一些随意选出的买主和卖主之间、殖民统治者跟被统治者之间、投资者跟生产者之间具体关系的组合，而是针对一个由物质、政治和文化生活的相互作用构成的多层次的复杂结构。这样，英国对印度次大陆的统治就不仅是孤立的商业或领土扩张的历史，而是英国投资对家庭生产体系的影响，也可以说是政府对地主与农民关系的干预。印度人被“纳入”世界体系包括出现讲英语的民族主义的专业精英，影响到阶级、等级和社会性别分工的新的法制框架和教育制度，以及农村生活和城市化的新格式。同样地，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是一系列复杂过程的一部分，包括：创立开拓者社区，法国在地中海的野心，法国成为欧洲强国，一系列企图驾驭当地精英和社区的尝试以及他们对这些尝试的反映。这是一个对诸多程序的相互关系以及多层面特征的评估问题，整体可能大于各个局部的总和。

这可以用更具体的实例加以说明。早在 19 世纪中叶在寻求商品贸易的过程中欧洲就开始对伊朗地毯加工业感兴趣了，当时伊朗经济跟欧洲市场的联系十分微弱，而英国和俄国对伊朗与其说是对经济感兴趣，还不如说是在战略意义上更感兴趣。这涉及到跟当地商人的关系，后来是跟地毯生产者的直接关系。由此，把一个以当地奢侈品市场和当地资源为基础的手工艺工业导向满足欧美消费的需求，进口染料和棉纱，以及欧洲对设计和质量的影响。伊朗的企业家们建立了生产体系和车间，重新

组织并加强了家庭劳动,雇佣妇女和儿童参加特定的手工艺辅助工作,以满足新的需求,并从新的来源获利。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以这些发展为基础的大规模出口工业不仅影响到伊朗很多地方的区域经济,也改变了城市生活和政治,因为地毯工人组织了手工艺协会,跟当地政府和欧洲领事讨价还价,并且作为一个团体对激进的民族运动进行干预。

如果要想把世界体系的成长跟对妇女和发展的讨论联系起来,那么,第二个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就是与此有关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伊朗人和印度人在物质上和政治上跟欧洲的企业家、政府、传教士或军人联系的多样性和范围,不仅对社区和家庭的经济活动或日常生活的结构有影响,而且对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了解都有影响。印度的耕种者受到土地、家族和权力以及税收的要求或市场压力种种新的关系的挑战。埃及和中国的城市知识分子和地方政客面临着印刷出版的报纸和电讯通讯所带来的挑战,这些挑战想要取代本土的教育、管理和文化生活方式的有关教育和技术、社会和文化价值,这是一些新问题。虽然第三世界内部对这些挑战的反映(从对欧洲文化输入的热情到抵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对我们的讨论更有意义的是在跟非欧洲社会接触中,欧洲人的意识有所改变。

出现在当今时代的“发展”模式,部分基于19世纪这类接触的经验,基于欧洲社会内部激进的变化。随着经济、历史和社会学这些新兴“科学”学科的出现,对于变化做系统研究和解释的兴趣。欧洲参与世界体系的扩张和强化,不仅着眼于贸易、殖民化、投资或军事侵略,也着眼于建构对这个体系中不同社会的新的系统的解释。有着丰富的文献介绍这些新的解释是如何从实际经验中发展出来的,以及这些解释如何发展成为一批有实力

的观点和形象。这里只需要提出几点。尽管这几点不一定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但肯定会对某些涉及发展讨论的有影响的观点、假设和论争引起注意。

19世纪的欧洲社会经历了重大且迅速的变化。新的社会、政治和技术发展显然使他们跟非西方社会越来越不相同，这就为他们对这些社会形成新的观点打下基础。欧洲在经济渗透、领土攫取和政治军事干预方面取得的成功是以有效地组织商业、外交或金融机构和新技术为基础的，似乎为欧洲优越感提供了经验性的证据。英法军队支持中国满洲统治者，英国在阿根廷修建铁路，在南部非洲建立采矿业，都是这种优越感的外在的、有目共睹的标志。俄国、德国或英国加工商品传入亚洲和南美市场，在非洲或秘鲁或奥托曼帝国所获的政治和领土优势，以及欧洲传教士、技术官员和游客遍及全世界，也是欧洲“成就”的类似表现。欧洲在他们自己的社会里改造经济、政治和社会机构和关系所取得的“成功”加上他们以及在欧洲以外推广企业、军事或教育形式所取得的“成功”，形成了他们评判自己和与别人比较的大背景。

欧洲对差异和优越的意识是通过一系列对立的定义和针锋相对的形象表达的。这些定义和形象加深了亚洲或非洲社会跟西欧比较时的负面概念，强调非欧洲社会的差异。如果欧洲经济活动形式被看做是动力十足和有进取心的，那么，对巴勒斯坦耕种者或马塞的游牧者的评价就只能是墨守成规和效率不高了。如果欧洲的政治生活被认为越来越受到宪法形式、公众舆论和理性辩论所制约，那么，印度王公政体或非洲酋长制就只能归纳为专横、腐败或暴戾。如果认为欧洲的政治机构通过渐进的改革和明确的道德标准在不断改进，那么，其他地方的政治机